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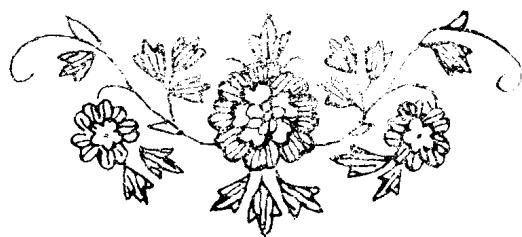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季羨林 著



中印文化关系史 论文集

王仲文 著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季羨林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61,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书号 11002·580 定价 1.50元

目 次

前 言	1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11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	40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44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51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 的作用	97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113
印度文学在中国	120
泰戈尔与中国	137
——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171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179
——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309
《列子》与佛典	312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浮屠与佛	323
论梵文 t d 的音译	337
关于《优哩婆湿》	378

泰戈尔《诗选》序	405
《五卷书》译本序	415
《五卷书》译本再版后记	433
《罗摩衍那》浅论	451
《沙恭达罗》译本新序	465
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	484

前 言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早已经绝版。在这新长征开始、中印两国人民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愿意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时候，有关方面的同志认为还有再版的必要。我经过考虑，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时间究竟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我又在广义的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范围内，写了一些文章。同时，还有几篇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出版前写成的、本来应该编入而疏忽未编入的文章。这二者加起来，从量上来讲已经超过了原书。又因为在编定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把有关古代印度语言的几篇论文抽了出来，编入另一个专论古代印度语言的集子中。结果现在编成的这个集子从原来十篇扩大成现在的二十一篇；从原来的十几万字扩大到现在三十多万字。如果仍然沿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个书名，就似乎不甚妥当了。于是我另外用了一个新名，名之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送到读者面前。

是不是这些文章都有很高的水平和价值值得长久保存呢？当然不是。但是，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有一些中国同志和印度朋友向我提出加强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象中国同印度这样两个国家有着至少二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是十分罕见的。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又一直到今天还都在朝气蓬勃地大跨步走上前去，这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两国人民都珍视我们的友谊，愿意继续发扬我们的友谊，切望了解我们友好历史的具体内容，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都还没有一本象样子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中国方面和印度方面都有人尝试着写过一些论述中印文化关系的书。比如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前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著名学者师觉月等等，都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印度年轻一代的朋友同我通信联系，想在这方面写点什么，探讨点什么。中国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的文章和汇集历史资料的书籍。但是，总起来看，都是零零碎碎的，不成体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中国古诗所说的：“慰情聊胜无”，我的这些本来只配覆瓿的所谓文章，就显得还有点用处，似乎还值得保留了。

我自己从大学念书起，就对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浏览所及，陆续搜集过一些资料，作过一些笔记。由于自己兴趣太广，所志不专，迄未能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自己虽然写过一点《中印文化交流简史》，最近找到残稿也只有七、八十页。后来涉猎印度典籍，发现其中也间有有用的材料。但是总起来看，这些材料是比较少的，时间有时也是难以确定的。印度人民是很有天才的人民，但对于历史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因此在三、四千年的文明史上，真正可以称为历史的书，简直少得可怜。中国人民也是很有天才的人民，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对历史似乎特有偏爱，成就也就特别辉煌。十七史、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固无论矣。其他散见于杂史、文集、笔记、游记、小说以及佛教高僧传中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材料真是车载斗量，与印度典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点印度朋友们也是承认的。最近我们接到印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信，信上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可见印度朋友意见之一斑。还有许多印度朋友曾多次向我提出，中印两国学者协作探讨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在

这样情况下，我们中国的学者来搞这方面的工作就成了不能推卸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自己愿追随志同道合者之后，竭尽绵薄，期有所成。我写的这些东西就目前来看只能算是一滴水、一块砖、一片瓦。一滴水投入大海，即使是微末不足道的，但究竟给大海增添了一滴水。一块砖盖在一座摩天大厦上，当然也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毕竟也给这大厦增添了一砖一瓦。中印两国两个伟大民族在过去二、三千年的时间内，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增强了两方面的感情，丰富了彼此的文化，这几乎形成了一个传统。这种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看样子还必然要继续下去。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要搞起来的。为了激励自己，督促自己，于其中照见自己的不足，暂时保存这些文章，似乎也就不无意义了。

一讲到中印友好关系的历史，我就觉得有一些前提应该加以说明或澄清，特别是在我这样一部论文集的前面，更有必要。首先是怎样来理解中印友好往来的历史？过去有一些好心的印度朋友曾对我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向印度学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是印度向中国学习”。这几句话，我在一九七八年春访问印度在德里大学向教师和学生做报告时，曾提到过。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然博得满堂的掌声。可见印度朋友一直到今天还是同意这个意见的。这些印度朋友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也是感激的。但这样说并不真正反映实际情况，我因而不完全同意。也还有另一种类似的说法，说中印文化关系在历史上是一边倒的买卖（one-way traffic）。我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长达二、三千年的中印友好关系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将来也还会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可贵的特点。象中印这样两个伟大的民族，都有独自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曾照亮了人类前进

的道路。在相互接触和学习中，也必然会既保存发展了自己文化的特点，又吸取学习了对方的文化。在什么时候也不会是“一边倒的买卖”，不管是倒向中国，或是倒向印度，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有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呢？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形象地说明我的看法。我想举制糖术这个例子。

中国古代就知道有甘蔗这种东西。比如《楚辞·招魂》中说：“膾鼈包羔，有柘浆些”。“柘浆”就是后来的“蔗浆”。可见楚国已经知道甘蔗，而且能把甘蔗压成浆，用以祀神。但是再进一步把蔗浆制造成糖却似乎还不知道。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籍、游记和其他著作中常常提到一种叫“石蜜”的东西。顾名思义，可能就是一种坚硬如石头的糖块，类似现在的冰糖，但不是白色。有这种“石蜜”的国家都在当时的所谓西域，比如波斯、康国、天竺等等。汉代张衡《七辨》说：“沙飴石蜜，远国贡储。”晋代傅巽《七海》也说：“西极石蜜”。可见中国本土还没有这种东西。其后的一些书籍中又提到一种叫“沙糖”的东西。顾名思义，可能就是现在的“红糖”。张衡的“沙飴”也可能就是这东西。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十二有“沙糖”、“石蜜”、“白蜜”这些词儿，把两者并提。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三说：“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鸟兽果物之状，以充席献。今之货者，又多杂以米饴诸物，不可不知。”李时珍对石蜜、沙糖、冰糖的特点和制造过程已经说得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用不着再加解释。关于唐太宗遣人赴印度学习制糖术的事情，中国史书上有一些记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列传》，摩揭它国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瀋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这一段记载还见于许多笔记中。这可能就是李时珍之所本。唐代一

些高僧的传记或著作里也提到石蜜，比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罗国说：“多甘蔗，出石蜜。”有的也提到沙糖，比如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方行饼果，后行乳酪，及以沙糖。”《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这里讲的是不是同《新唐书》讲的是一回事？我不敢确说。从以上种种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传到中国以前的“石蜜”和“沙糖”都是紫色的。把紫色的糖变成白色的，要进一步加工。这个加工过程可能是中国完成的。《新唐书》上所说的“色味愈西域远甚。”“色”指的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从紫红色变成白色吗？这里还要插叙一下埃及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元世祖时有埃及国开罗人到了中国福建，教授净糖术。这里指的可能也是把红糖净化为白糖。十四世纪的伊本·白图泰的《游记》里说：“你在中国找到很多的糖，同埃及的一样好，实际上是更好一些。”根据这些记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如下的推测：中国唐代从印度学习了制糖术以后，加以提高，制成了白糖。同时埃及也在这一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并且在元朝派人到中国来教授净糖的方法。实际上中国此时早已经熟悉了这种方法，熬出的白糖，按照白泰图的说法，甚至比埃及还要好。这件事从语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现代印地语中，白糖、白砂糖叫做cīni，cīni的基本含义是“中国的”。可见印度认为白糖是中国来的。《印地语辞海》说，cīni 现在在印度已经普遍流行了。但在开始时，人们称之为洋货，因为cīni原来是外国输入的。当时人们食用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合教规的。但是现在人们都毫不犹豫地食用这种糖了。印地语中还有一个字misari，指冰糖(sugar-candy)。misari的基本含义是“埃及的”。可见印度人心目中埃及来的糖是冰糖。但是阿拉伯语糖却叫做sukr，显然是从英文sugar或法文sucre转借来的，而英文sugar，法文sucre，或德文Zucker，

俄文 сакар, 又都是从梵文 śarkarā 转借来的。

这里还牵扯上了波斯(现在的伊朗)。有的中国古书上说石蜜是从波斯传来的。有的书上说由波斯运到四川的糖极好。^① 这些情况, 我们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现在继续从语言方面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的《翻译名义大集》关于甘蔗和糖有下列几个字:

5695	ikṣuḥ	荳菜, 甘蔗
5696	guḍaḥ	黑糖 〔和〕糖块
5721	śidhuḥ	甘蔗酒
5788	śarkarā	糖
5837	phaṇitam	糖霜 〔和〕粗糖

《梵语千字文》^② 糖叫做 guḍa。《梵语杂名》^③ 标明: “沙糖 遇怒”, “遇怒”就是 guḍa 的音译。《枳橘易土集》引用了《梵语杂名》, 但有错字。《唐梵两语双对集》^④ “石蜜 舍嚩迦罗 śarkarā”, “沙糖 遇怒 guḍa”。《翻梵语》卷第十^⑤ 提到《善见律毗婆沙》卷第一七中的“乌婆陀颇尼”, 注明: “律曰: 薄甘蔗糖”。《善见律毗婆沙》^⑥ 原文是: “广州土境有黑石蜜者, 是甘蔗糖, 坚强如石, 是名石蜜。伽尼者, 此是蜜(madhu)也。乌婆陀颇尼, 颇尼者, 薄甘蔗糖。”这里的“颇尼”就是《翻译名义大集》中的 phaṇitam。《翻译名义大集》中的 śarkarā 这个字从印度传出去, 几乎传遍了世界。guḍa 这个字, 是一个古字,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有。从以后

① 见 B. Laufer, Sino-Iranica; 中译本: 《中国伊朗篇》, 商务印书馆, 一九六四年版第二〇一——二〇二页。

② 《大正大藏经》卷五四, 页一一九二上。

③ 同上书卷, 页一二三八中。

④ 同上书卷, 页一二四三中。

⑤ 同上书卷, 页一〇五三中。

⑥ 同上书, 卷二四, 页七九五中。

的许多词典中，比如 Bhāvapraśāsa、Amarakośa 等等中都有这个字。《五卷书》中也有。但是含义并不一致。有的说它是干的圆球状的糖，有的说它是煮熟了的甘蔗汁，有的又说它就是蜜。总之大概是一种还没有净化的粗糖。

把以上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就约略可以想象出一条红糖、白糖和冰糖传布的道路。中国古代有甘蔗，也有蔗浆，把蔗浆熬成糖的方法是从印度传入的，时间在唐太宗时代。中国接过了这熬糖方法又加以提高，熬成了白糖，又传回到印度去。至于埃及什么时候开始熬糖，详细情况，我没有研究。反正埃及熬的糖也颇有点名声，也传到了印度和中国。你看，我们天天吃的糖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东西，但其中竟有这样许多文章，它牵扯到中国、印度、埃及和伊朗四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这确实可以称为一个佳话。这充分说明，我们四个国家在过去文化交流之密切；也可以说明，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确实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互相渗透，而且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明白了这些情况，还能说两国关系是一边倒的买卖吗？难道这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吗？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看来不大而实则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怎样看待学习外国东西的问题。“四人帮”那一伙民族虚无主义者兼民族自大狂夜以继日地关起门来偷偷摸摸地欣赏外国的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但公开却对于学习外国一概称之为“洋奴哲学”。这种说法影响了不少的人。在他们手中，“洋奴哲学”也成了一顶大帽子，动不动就给人扣在头上，以致有不少人望“洋”兴叹，谈外色变。学习外国也成了一个禁区。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论大小、不论新形成的民族还是古老的民族，都各有优点与缺点，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不管多么闭塞，多么原始，完全不受外来的影响。我们承认学习了外国的好东西，并不是什么耻辱，我们承认曾学习了印度的许多好东西，这也并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尊严。当

然我们也送给印度人民不少非常有价值的发明创造，比如罗盘、火药、蚕丝、造纸等许多重大发明就是显著的例子。印度人民也是承认的。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但过去互相学习，而且现在也在互相学习，将来还要继续互相学习。一个完全闭关自守的民族是决不能长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样一个“禁区”，我们也必须解放思想，努力打破。让我们敢于向外国学习，善于向外国学习，以期达到借鉴的目的。

从我发愿搞中印文化关系史以来，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年了。中间屡经沧桑，饱历风雨。因限于书籍和资料，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范围多次调整。又牵于杂务，无从专心致志。但探讨中印文化关系之志，却始终不渝。平常在浏览之余，做了一些笔记，有的写在大本子上，有的就顺手写在一些小纸片上。一直没有系统加以整理。虽然也一度立志先把唐代中印文化关系史写出来，也只是写了几章，全书也迄未写成。可惜的是，在风雨交加之时，所作笔记，多所散失。到现在光阴流逝，岁月蹉跎，自己已垂垂老矣。几次拿起残存的旧稿，有的已经写成了一半，有的已有现成的材料；几次看到那成堆的大大小的纸片，心里就激烈斗争。要想完全找到过去所作的笔记，已不可能。从头作起，又势有所不许。中国朋友和印度朋友对我殷切的希望又时时压上心头。使我欲罢不能，欲行又止。印度古代神话有一个特哩商拘的故事，他想上天，但被神仙推了下来，想回地上，又不可能，就悬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现在真成了中国的特哩商拘了。

我因此就时时想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的一段记载^①：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梵本停住告

^① 《大正大藏经》卷五〇，页二七六下。

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今欲往兰芝等谷礼拜辞俱胝佛像。

我每读这一段，就不禁油然起共鸣之感。我还记起鲁迅先生晚年也谈到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总想多干一点事情。他在《且介亭杂文附集》《死》里说：

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不知不觉，记得了自己的年龄。

玄奘当时也不过六十来岁，鲁迅那时也不过五十多岁。今天我已经超过他们将近十岁了，才开始有赶快做的想法。决不是我比鲁迅高明。只是因为现在已经换了人间。不但同唐代大不相同，有如天壤。同鲁迅时代也完全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了，老的标准也不同了。仅以鲁迅而论，他所处的环境，是白色恐怖，阴森暗淡。我今天所处的环境是光天化日，朝气蓬勃，十亿人口的大军正向着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豪气贯日月，春色满乾坤，可以惊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摧枯拉朽，可以移山倒海，前程似锦，光辉灿烂。个人一点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即使我有时有这种赶快做的想法，这也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来既不伤感，也不悲观，既有老而不叹，亦无贫之可嗟。环视周围，我大学时代许多老师，年近八旬或年逾八旬，仍然精神矍铄，意气风发，在那里努力写作。这种感染力是无穷的。我同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年轻人，到他们那样的年龄至少还有十多年二十年，我有什么理由、什么根据可以悲伤老大，无所事事呢？尽管还有许多别的工作，我还仍然有信心，能在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做出一些贡献。把写了一半的那些文章补起来，把能够找到的资料找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尝试着写一部《中印文化关系史》或断代的《中印文化关系史》，来满足许多中国和印度朋友对我的期望。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的序言，在本书中仍旧保留下来。这

样就能保留当时的心影。时过境迁，让旧的回忆同当前的现实永远密切结合起来，可以兴，可以立，鼓舞自己，鞭策自己，永远不懈怠地奋斗下去。

一九七八、十二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 时间和地点问题

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① 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钞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放一异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② 这一点连欧美资产阶级的抱着根深蒂固的成见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学者一向是努力抹煞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的,抹煞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的贡献的,譬如对罗盘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他们都竭力加以曲解,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发明的光荣从中国人手中夺走硬扣到自己头上。独独对于纸的发明,即使他再不甘心,却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低头。^③

① 关于中国纸的历史参阅桑原骥藏《东洋文明史论丛》页九三——一一八,《纸の历史》;内藤虎次郎《东洋文化史研究》页七五——八四,《纸の話》;劳干:《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傅振伦:《中国纸的发明》,《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八月;袁翰青:《造纸我国的起源和发展》,《科学通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考古学报》,第八册。

② Th. Lindner,《世界史》,第四册,第八节。

③ Thomas Francis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 1925, 第一章。

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一〇五年)蔡伦^①发明了以树皮、麻头、破布和鱼网造纸的方法以后，很快地就在中国传播起来。以后逐渐传到现在的新疆，从新疆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到非洲北部、西班牙，更从非洲北部、西班牙传到欧洲的意、法、德、奥、瑞士、英、荷等国，终于传遍了全世界。中国纸和造纸法的传布史是一个极大而又极有意义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想从这个大题目里选出一个比较小的题目来，谈一下中国纸和造纸法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入印度的问题，一个过去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② 目的在给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交流再多提供一些事实，把中印关系史上这个重要的空白填补起来。

印度古代的书写资料

印度古代是没有纸的。中国在发明纸以前是用丝和竹板等作书的。印度有时候也用木板和竹片，但不像在中国这样普遍。他们常用白桦树皮，梵文叫做 *bhūrja* (*Baetula Bhojpattr*)。喜马拉雅山下有极大的桦树林，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印度人就知道用这种东西，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时，他们已经用了。在梵文古典著作里常遇到 *bhūrja* 这个字。这种树皮有时候就干脆叫做 *lekhana*，*lekhana* 最初是书写资料的意思，纸输入后，也用这个字来称呼

① 《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东观汉记》卷二十《蔡伦传》注：“案一本作伦典尚方造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鱼网名网纸。”实际上，这种造纸的方法可能已经在民间肇端，蔡伦只是把这种方法提高了一步，集其大成。《学斋占毕》卷二，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书，注谓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恐亦非始于蔡伦。”

② 印度学者 P. K. Gode 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输入印度的论文：《中国纸输入印度考》(*Migration of Paper from China to India*)，1944，但不详细。